

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对民营企业职工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影响机制 —— 以生活满意度和收入为调节变量*

李素利¹ 张金隆¹ 刘 汕²

(¹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4) (²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 为了探索养老保障政策性因素与非政策性因素对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共同作用机制, 基于养老保障政策在我国实行的独特性, 从民营企业职工的视角提出了生活满意度和收入调节影响养老保障政策价值与养老生活支持感之间关系的模型, 并在 203 份调查样本的基础上, 通过实证研究和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 民营企业职工感知的养老保障政策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但是民营企业职工当前的高生活满意度和收入会降低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的积极影响。因此, 养老保障政策价值的提升应该均衡兼顾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因素。建立良好的养老保险政策是提高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养老生活支持感并非单纯由政策性或非政策性因素所决定, 而是取决于两类因素的均衡程度。

关键词 养老保障; 政策价值; 民营企业; 生活支持感; 满意度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¹对养老生活的保障提出了严峻挑战, 政府在重视家庭养老的同时, 也在加大社会养老保险对养老生活的保障作用(Kim, 2012)。在我国, 由于历史遗留和转制成本问题, 企业职工是国家政策倾斜的主体(郑功成, 2008)。“十一五”以来, 国家先后出台了 20 多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和规定, 养老金待遇连续实现八连调, 年均增速达到 13.07% (机关事业单位是 7.49%)。但是许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职工仍然抱怨退休工资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差距较大、老年生活支持感较低、老年生活质量无保障。究其原因, 多为养老待遇偏低、缴费责任过大、制度体系过繁造成, 而这些均属于养老保障政策的价值范畴。

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在法规制定与政策监管方

面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来说均无实质差异, 但在养老待遇、缴费责任、基金统筹、筹资机制方面却有显著不同。民营企业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总体来说低于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他们的养老待遇基本取决于工作期间的个人平均缴费指数和个人账户储蓄额, 且养老金替代率较低。而国有企业职工除基础养老保障之外, 还有单位提供的额外福利(补充性商业保险), 养老待遇相对民营企业职工更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 同时已退休人员退休金按照在职人员工资增长率进行调整, 调整幅度较大, 待遇水平明显高于企业职工。其次, 企业职工的养老缴费责任高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企业职工的缴费由企业缴费和职工个人缴费两部分构成, 但一些民营企业为节约人力成本, 仅按照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来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 使民营企

收稿日期: 2013-03-19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01060 和 71271095)、“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子课题(2012BAJ05B06)、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7003)资助。

通讯作者: 刘汕, E-mail: shan.l.china@gmail.com

¹ 根据民政部 2012 年 6 月 23 日发布的《2011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截至 2011 年底, 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1.85 亿人, 比上年增长了 4.13%, 占全国总人口的 13.7%, 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 3/5, 相当于整个欧洲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总和。

业职工的老年待遇水平降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无需缴纳任何养老费用,均由国家财政负责,这导致了零投入、高回收的养老“特殊化”,引起了企业职工的不满。第三,民营企业职工的基金统筹层次低。国企人员相对稳定,退休后保险兑现更可靠,民企人员流动性相对较大,在跨省社保未联网前提下,流动人员退休保障性较差,不仅使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进程在全国极不平衡,也会降低社会保险基金的风险分散功能。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仍然实行传统的“单位”管理模式,各部门基本上都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本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工作,养老兑付更有保障。随着民营企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点,直接关系民营企业职工个体发展和未来生活的养老问题已不容忽视,如何改变民营企业职工在养老待遇、缴费责任、基金筹集等方面的劣势地位已成为公共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从民营企业职工的视角探讨其感知的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对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影响机制,对于我国民营企业职工养老问题的解决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些学者认为伴随着家庭规模减小、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问题的出现,家庭支持对养老生活的支持力有所减弱,由政府直接干预实行的养老保障的作用日益增强(Bozo, Toksabai, & Kürüm, 2009; Golden et al., 2009)。随着老年一代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由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所带来的老龄危机需要依靠社会养老保障来解决(Kim, 2012; Lee & Mason, 2011)。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民营企业职工视角下基于政策的养老生活支持,即民营企业职工感知的通过立法等制度化手段对养老生活(非特指老年人)进行的社会保障(Chalise, Saito, Takahashi, & Kai, 2007; 陈功, 2003)。

虽然一些研究强调养老保障在养老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并非存在必然性的因果关系(Shi, 2006),预示着在养老保障和养老生活支持感之间可能存在其它因素的作用。有研究提出,当前的生活状态与养老政策的共同作用可能会影响个体感知的养老生活质量和生活支持(Frommert, Heien, & Andreli, 2009),而生活满意度即是个体对自己目前生活状态进行评价的一种主观判断。有鉴于此,本文在养老保障政策价值与养老生活支持感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将深入探讨生活满意度与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对民营企业职工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共同作用。

从以往研究可知,养老待遇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支持感(Hanel & Riphahn, 2012; Kim, 2012)。但对在职民企职工来说,高收入对未来养老风险的强抵御能力使其不会过分依赖替代率较低的养老保障,这也表示高收入可能会减弱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对养老生活支持感的积极作用。虽然一些研究开始将养老保障、养老待遇和养老生活支持感联系起来(Lee & Mason, 2011),但是没有探讨收入(特别是当期劳动者的收入)是如何影响养老保障政策价值与养老生活支持感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研究还将关注收入在二者之间的作用。

2 研究基础、模型与假设

2.1 养老保障政策价值

养老保障政策价值是指养老保障政策所体现的效用,旨在衡量养老保障政策对所确认问题达到的解决程度和影响程度,以求通过优化政策运行机制的方式,强化和扩大政策效果的一种度量(Dunn, 2003)。社会成员感知的养老保障政策价值更能直接反映政策对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改善老年生活质量的程度(郑功成, 2008),因此,本研究从个体感知的角度反映养老保障政策的价值。

大多数学者在养老政策价值维度的选择上,建议从效益性和充分性对经济价值进行测度(Béland & Yu, 2004; Mesa-Lago, 2007; Wentworth, Neaton, & Rasmussen, 1983),从公平性和回应性对社会价值进行测度(Meneguello, 2005; Quadagno & Pederson, 2012),从适当性和共享性对政治价值进行测度(Bozeman & Sarewitz, 2011; Mesa-Lago, 2007)。基于此,本研究将采用这一分类标准,将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分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三个维度。其中,在经济价值中,效益性是指群体的养老受益程度,充分性是指为实现既定养老目标所需条件的完备程度。在社会价值中,公平性是指既定养老目标被不同受益群体公平分配的程度,回应性是指既定目标满足受益群体需要的程度。在政治价值中,适当性是指政策与社会发展相适宜的程度,共享性是指共享政策价值的程度(Dunn, 2003)。

2.2 养老生活支持感

有研究认为源于制度保障的养老生活支持仅仅是一种边缘补充(Golden et al., 2009)。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通过立法手段实行的社会养老保障更能增强个体对养老的信心。一些研究认为养老政策所提供的公共养老提高了个体对老年生活权

益的支持程度(Hanson, Liedberg, & Öwall, 1994; Kim, 2012), 甚至提出养老生活支持感主要来自国家给予的充分养老保障(Lee & Mason, 2011)。同时, 一些学者强调养老生活支持感是一种承诺, 社会成员首先感知国家或组织如何对待自己, 经由归纳和总结, 进而对政府或组织的态度做出评价和判断(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chison, & Sowa, 1986; Ravishankar, 2010)。有鉴于此, 本文将养老生活支持感定义为感知的通过立法等制度化手段对养老生活进行保障和支持的程度。

2.3 养老保障政策价值与养老生活支持感

一些学者提出养老待遇、养老公平对养老生活支持感和生活质量有较大的影响(Kim, 2012), 社会养老制度的完善、养老自尊的重视、养老服务的完善也会促进养老生活支持感的提高(Cai, Giles, O'Keefe, & Wang, 2012), 由此可见, 他们均肯定了养老保险及相关政策对养老生活有一定保障作用。然而, 关于养老保障政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对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即直接作用还是间接作用)却鲜有涉及。同时大多数研究仍然是以定性为主, 缺乏定量化的分析和实证性的检验。

养老保障政策的经济价值是指养老保障政策为个体带来的经济收益, 主要体现在个体有自尊且足额准时地领取养老金和既定养老目标的实现程度上(Mesa-Lago, 2007)。每月及时、自尊、足额地领取养老金, 可以免除企业职工的老年后顾之忧, 增强其养老生活自尊感, 而生活自尊感是促进代际公平、满足企业职工老年精神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穆光宗, 2004)。养老基金的不断增长和安全有效的保值增值, 减少了政府的未来养老支付压力, 有效保障了企业职工养老生活水平。民营企业职工养老待遇的高低直接取决于工作期间的个人缴费积累, 养老待遇的提高基本依赖于养老基金的稳健增长, 因此, 其养老生活支持感会受到养老基金运行状况的影响。此外, 养老保障政策对企业职工养老权益的保护及其高适用性, 可以增强他们的参保意愿, 并进一步提高其对未来养老生活的信心。

H1: 从民营企业职工的角度来看, 养老保障政策经济价值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养老保障政策的社会价值是指养老保障政策对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所发挥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政策的覆盖率、待遇差距缩小和个体对政策

的满意上(Quadagno & Pederson, 2012)。养老政策的高覆盖率和养老待遇的提高可以增强企业职工养老生活的经济支持感和生活公平感, 是保障职工“老有所养”的重要前提, 而公平性对生活质量和支持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客观需求被满足所带来的效用(Dolan & White, 2007)。企业职工对政策的高回应性表明职工对养老政策的充分认可, 认为自己的养老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确实可以通过养老保障的形式得到提高(Dolan & Metcalfe, 2012a; Taylor-Gooby, 2002)。民营企业职工没有国有企业职工拥有的额外福利保险, 也没有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拥有的高养老替代率, 这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心理弱势”, 但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政策, 能让他们感受到养老保障的机会公平。养老政策执行的高效性和养老经办机构服务质量的提高, 体现的是过程公平。养老待遇差距的逐步缩小, 体现的是结果公平, 这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H2: 从民营企业职工的角度来看, 养老保障政策社会价值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养老保障政策的政治价值是指养老保障政策为完善国家政治体系及增强个体对政府的政策支持感所发挥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制度体系及监管机制的完善和个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程度(Bozeman & Sarewitz, 2011)。养老遗留问题的逐步解决, 从根本上维护了利益主体的基本权益, 从而使其能够感知到政策的支持(Dolan & White, 2007; Soares, 2005)。养老保障政策使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同时, 以国家或集体的共助和风险分摊来保障个体的养老权利, 通过全体社会成员对各种社会风险的共同分担, 减少初次社会分配的不公平问题, 因此能够减轻职工对未来养老的担心, 增强其养老生活支持感。特别是对于工作流动性相对较强的民营企业职工而言, 若养老保障配套制度不完善、监管机制弱、养老基金统筹层次低, 则会使区域间养老保险制度的协调能力降低, 从而导致养老金无法正常续接, 这会直接降低民营企业职工的参保意愿, 进而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产生负面影响。

H3: 从民营企业职工的角度来看, 养老保障政策政治价值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2.4 生活满意度及其与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和养老生活支持感之间的关系

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

生活质量做出的主观评价,是个体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生活条件的一种判断,也是自己面对生活的一种态度(Dolan & Metcalfe, 2012b)。虽然过去研究没有明确表明生活满意度可以调节政策价值和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关系,但是有研究表明公众满意度及态度可以作为调节变量。比如,在公共管理研究中,有研究认为公众满意度会使养老保障的价值发生跳跃性改变(Quadagno & Pederson, 2012),积极的公众态度会提高养老保障所带来的养老生活支持感,而消极的公众态度会抵制现有或过去养老政策的作用,导致养老生活支持感的降低(Fernández & Jaime-Castillo, 2013)。

生活满意度高的民营企业职工拥有积极的养老态度,与其思考如何保障养老,他们更愿意花时间来成就目前的事业和增强自己的社会连通性(Pinquart & Sörensen, 2000)。同时,养老保障政策的轻微变动并不会引起他们过多的反应,政策价值对他们来说反而居于次要地位,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影响也会相应降低。而生活满意度低的民营企业职工对养老持消极态度,多把养老希望寄托于国家提供的基本养老保障,因而对养老待遇支付和基础养老服务提供的关注度较高,并更加依赖国家养老保障政策。因此,生活满意度低的民营企业职工对养老待遇水平、现阶段的缴费比率和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比生活满意度高的职工更为敏感。他们希望国家能为其提供公平、正义、同质的老年生活,因此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对他们感受到的养老生活支持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H4a: 从民营企业职工的角度来看,当前生活满意度越低,养老保障政策经济价值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的积极作用越强。

H4b: 从民营企业职工的角度来看,当前生活满意度越低,养老保障政策社会价值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的积极作用越强。

H4c: 从民营企业职工的角度来看,当前生活满意度越低,养老保障政策政治价值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的积极作用越强。

2.5 收入及其与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和养老生活支持感之间的关系

关于收入对个体生活的影响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高收入能够满足个体偏好(购买贵重物品、进行奢侈活动)并与生活快乐正相关(Diener, E., Diener, M., & Diener, C., 1995),同时个体的高收入使其对未来生活更充满信心(Diener,

Tay, & Oishi, 2013; Ferrer-i-Carbonell, 2005)。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发现,在长时间序列下,收入的提高会使个体评判生活快乐的标准同比例提高,收入与生活快乐的关系呈弱相关,但短期内个人的收入水平与个人的生活快乐水平显著相关(Easterlin, McVey, Switek, Sawangfa, & Zweig, 2010)。生活快乐包括客观的基本需求和主观的生活满足(Diener & Lucas, 1999),这与养老生活支持感所对应的两个方面(客观感知的经济支持和主观感知的生活支持)不谋而合。

尽管目前没有研究专门论证在职职工收入与养老保障政策价值之间的关系,但是有研究认为养老保障政策的稳定性与养老金缴纳比率相匹配时,会对养老生活支持感产生影响(DiNapoli, 2012)。这一观点似乎说明收入和养老保障政策价值之间可能有一定的交互作用。因此,有证据表明收入会调节影响养老保障政策价值与养老生活支持感之间的关系。

对民营企业职工来说,高收入满足了其生活所需和主观偏好(McBride, 2001),但由于退休前后的收入差别比较明显,他们并不会满足养老保障提供的基础养老金(Ferrer-i-Carbonell, 2005),也不会满足指定养老机构提供的基础养老服务,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养老生活质量的保障多来源于自己现在的工作努力。由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仅占其预期老年收入的较小部分,他们对逐年提高(但仍然较少)的养老金待遇不会过度依赖,对其未来养老生活的影响相应较小。而对低收入职工来说,目前的物质生活水平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并无多余收入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若现期的养老缴费比例较高,会使他们的物质生活更加拮据。因此养老保障政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对于其养老生活支持感起到了更加决定性的作用。

H5a: 从民营企业职工的角度来看,收入水平越低,养老保障政策经济价值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的积极作用越强。

H5b: 从民营企业职工的角度来看,收入水平越低,养老保障政策社会价值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的积极作用越强。

H5c: 从民营企业职工的角度来看,收入水平越低,养老保障政策政治价值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的积极作用越强。

2.6 控制变量

个性是指个体在物质活动和交往活动中形成

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稳定的心理特征系统(Jovanovic, 2011)。以往研究发现, 性格外向与生活支持感有较强的相关关系(Steel, Schmidt, & Shultz, 2008), 这之前学者关于个性特质会对社会支持感产生直接影响的结论一致(Russell, Booth, Reed, & Laughlin, 1997)。为避免由于个性差异所引起的偏差, 本研究把个性作为控制变量。由于企业发展水平的差异, 不同企业的员工对于养老生活支持感可能也会存在差异, 因此民营企业员工所在的企业也作为控制变量。

根据以上变量和假设, 可构建如图 1 所示的研究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来收集定量数据, 从而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不少学者建议, 政策受益者作为独立个体来评价政策价值更为直接有效(Béland & Yu, 2004; Dolan & White, 2007)。结合我国民营企业职工养老保障的特点,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确定为民营企业职工(即政策受益群体)。调查对象来自湖北省具有代表性的 15 家民营企业, 其中有房地产、通信设备制造、金融保险、建筑、工程、服务、食品加工、零售等, 在企业相关领导的配合下, 发放问卷 300 份。截至 2012 年 12 月, 共回收得到 203 份有效问卷(均为纸质问卷), 回收率达到 71%。在与民营企业职工访谈过程中发现, 他们均能够顺利回答问卷中的问题, 甚至是开放式问题(比如, 您认为目前民营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障存在

哪些问题)。从教育程度来看, 样本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职工达到 128 人(63.1%), 占主要部分。高学历、高素质的调查对象进一步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因此, 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是合适的, 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本研究通过比较前后两批回收的问卷来评估无响应偏差。各变量均值 t 检验(双侧)的结果如下: 效益性($p=0.67$), 充分性($p=0.26$), 公平性($p=0.12$), 回应性($p=0.78$), 适当性($p=0.10$), 共享性($p=0.49$), 生活支持感($p=0.32$), 生活满意度($p=0.47$), 收入($p=0.42$), 个性($p=0.57$)。结果表明, 前后期间卷无显著差异, 因此不存在无响应偏差。

对于共同方法偏差, 本文采用标记变量技术对变量进行检验(Lindell & Whitney, 2001; Malhotra, Kim, & Patil, 2006)。通过调查过程中收集的数据识别了最弱相关标记变量(R_{M1})和次弱相关标记变量(R_{M2})。同时, 计算了两个变量与学习变量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R_{M1avg} 和 R_{M2avg}), 结果如附录 1 所示。经过分析, 相关系数仅出现了微小的变化, 所有相关系数仍然保持同一显著水平, 因此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变量测度

在问卷设计中, 各变量的测度项设计借鉴了现有变量。对于效益性、充分性、公平性、回应性、适当性、共享性、生活满意度和养老生活支持感八个变量的测度项均使用李克特七级量表进行评分(从“很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对于收入变量, 采用客观尺度进行度量, 将其分为“ ≤ 1000 元”、“1001~2000 元”、“2001~5000 元”、“5001~10000 元”和“ ≥ 10001 元”五个量级。对于个性变量, 按照“内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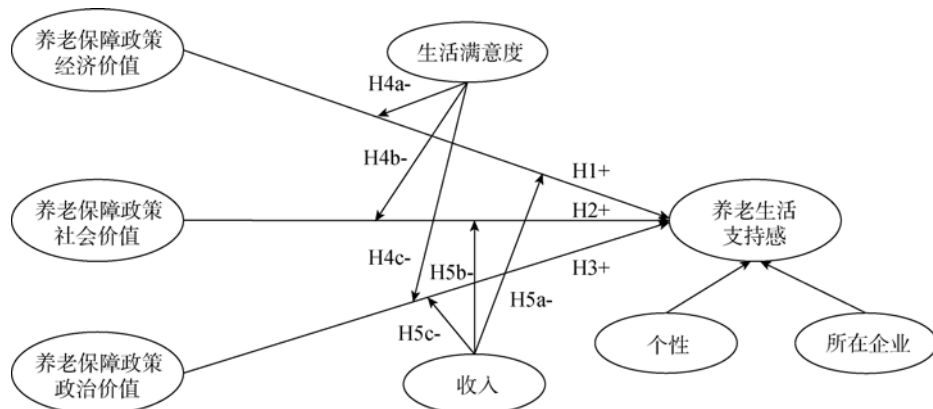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模型

注: ①养老保障政策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为二阶变量, 其中效益性和充分性是经济价值的一阶变量, 公平性和回应性是社会价值的一阶变量, 适当性和共享性是政治价值的一阶变量; ②员工个性和所在企业是养老生活支持感的控制变量。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样本特征	范围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89	43.8%
	女	114	56.2%
年龄	<25 岁	46	22.6%
	26~45 岁	140	69%
	46~55 岁	14	6.9%
	>55 岁	3	1.5%
	专科及以下	75	36.9%
教育程度	本科	104	51.3%
	硕士及以上	24	11.8%
个性	内向	56	27.6%
	外向	54	26.6%
	混合	93	45.8%
收入	≤1000 元	1	0.5%
	1001~2000 元	36	17.7%
	2001~5000 元	115	56.7%
	5001~10000 元	38	18.7%
	≥10001 元	13	6.4%
婚姻	未婚	74	36.4%
	已婚	129	63.6%
住房	拥有	137	67.5%
	不拥有	66	32.5%

“外向”和“混合”三个指标进行测度。对于员工所在企业变量，则采用企业名称进行区分。为了保证准确性与合理性，问卷首先经过了国家审计署负责养老保障工作的三位专家审阅。他们普遍强调随着我国“养老人性化”²思想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文化素养的提高，养老金的领养必须同时重视职工的物质需求和“精神赡养”，即保障养老待遇稳步提高的同时也应关注他们的养老自尊需求，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支持(穆光宗，2004；郑功成，2008)。为了使得每个测度项和问题便于理解，问卷接着在 35 名企业人员中进行了预测试。经过反馈和修改，最终形成了变量及其测度项，如表 2 所示。

在表 2 中，民营企业职工所感知养老保障政策价值的测度项涉及到三个层面：国家政策层面、企业层面和职工个人层面。其中测度项 C21, C22, C23, C31, C32, C33, C34, C44, C51, C52, C53, C54, C61, C62 涉及国家政策层面；C24 涉及企业层面；C11, C12, C13, C14, C41, C42, C43, C63, C64 涉及员工

个人层面。虽然一些测度项涉及国家政策和企业层面，但随着媒体(如电视、网络等)不断加大对养老问题的宣传力度以及民营企业职工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能够有效回应和反馈关于国家政策层面的问题。同时，民营企业职工比以往更加重视未来的养老生活，他们会主动了解所在企业的养老保险状况。通过自己的参保经历以及与其他职工关于养老问题的沟通交流，使得他们也能有效回答企业层面的问题。

4 研究结果

4.1 模型测度

本文采用偏最小二乘法(PLS)技术，使用 Smart PLS 2.0 对模型进行测度和检验，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来验证假设。在模型测度中，按照变量划分标准(Petter, Straub, & Rai, 2007)，所有变量均为反映变量。养老保险政策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作为二阶变量，其中效益性和充分性是经济价值的一阶变量，公平性和回应性是社会价值的一阶变量，适当性和共享性是政治价值的一阶变量。一阶变量对于二阶变量均是反映变量。所有一阶变量在二阶变量中的权重均显著($p<0.05$)，且所有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1.81，因此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内部一致性和收敛效度通过变量分项对总项的相关系数，综合信度和因子抽取平均方差进行检验(Chin, 1998)。变量分项对总项的相关系数如附录 2 所示。无论是一阶还是二阶变量的分项到总项的相关系数均高于 0.70，表明每个测度项与所属变量之间的共同变化超过了误差变化。交叉承载系数同时显示每个测度项与所属变量的相关系数高于该测度项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且差异大于 0.1 (Gefen & Straub, 2005)。变量的均值(M)，标准差(SD)，综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Cronbach α 's，因子抽取平均方差(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3 所示。综合信度和 Cronbach α 's 值均高于 0.70，因子抽取平均方差值都高于 0.50 (Fornell & Larcker, 1981)。在区别效度方面，所有变量之间系数的平方值均小于变量的因子抽取平均方差值，满足区别效度检验的要求。因此，测度检验结果反映了模型具

²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在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持续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养老保障全覆盖、养老收入差距缩小、养老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本养老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及加大改善民生力度的目标。

表 2 变量及测度项

变量		测度项	相关文献
经济价值 (EV)	效益性 (C1)	C11 我认为企业退休职工每月能及时、足额地领取养老金 C12 我认为企业退休职工能够有自尊地领取养老金 C13*我认为企业退休职工退休前后收入相差不大 C14*我认为企业退休职工能得到专业化的老年服务	Béland & Yu, 2004; Birkland, 2010; Bozeman & Sarewitz, 2011; Jupe, 2012; Soares, 2005; 郑功成, 2008; 穆光宗, 2004
	充分性 (C2)	C21 我认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额在不断增加 C22 我认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效果较好 C23 我认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为保障企业退休职工的老年生活权益而设定的 C24 我认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适用于全体企业职工	
	公平性 (C3)	C31 我认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实现了制度全覆盖 C32 我认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已实现了人群全覆盖 C33 我认为国家稳步提高了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待遇水平 C34 我认为国家逐步缩小了企业退休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养老待遇差距	Béland & Yu., 2004; Bozeman & Sarewitz, 2011; Meneguello,2005; Quadagno & Pederson, 2012; 郑功成, 2008; 邓大松, 薛惠元, 2010; 董克用, 孙博, 2011; 徐宏伟, 2009
	回应性 (C4)	C4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企业职工会参加养老保险 C42 我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较满意 C43 我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的服务较满意 C44 我认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会成为职工养老的主要模式	
社会价值 (SV)	适当性 (C5)	C51 *我认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能与其它养老保险协调发展 C52 我认为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设置的相关配套制度较完善(户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 C53 我认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部门的监督机制完善 C54 我认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我国社会发展现状相适应	Bozeman & Sarewitz, 2011; Mesa-Lago, 2007; Shi, 2006; van Vliet, Been, Caminada, & Goudswaard, 2012; 郑功成, 2008;李珍, 王 海东, 2009; 邓大松, 薛惠元, 2010; 徐宏伟, 2009
	共享性 (C6)	C61*我认为地方政府在养老中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C62*我认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责任分担机制较科学 C63 我认为企业退休职工能够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果实 C64 我认为企业职工能够与国家、企业共同分担养老压力	
	生活满意度(SL)	C71 我的生活在很多方面接近于理想状态 C72 我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 C73 我对我的生活非常满意 C74 我已经得到了我生命中最想获得东西 C75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的生活, 我不会做任何的改变	Diener, Emmons, Lars- en, & Griffin, 1985
	收入(IC)	C81 我目前的收入水平	Easterlin et al., 2010
养老生活支持感(LS)		C91 养老保障政策让我感到国家对我的照顾 C92 养老保障政策让我减轻对未来养老的担心 C93 养老保障政策让我对自己老年的生活水平有信心 C94 养老保障政策让我对自己老年的生活质量有信心	Zimet, G. D., Dahlem, Zimet, S. G., & Farley, 1988; 郑功成, 2008

注：标*是经验证删除的测度项

有良好的测度属性。

4.2 假设检验

使用PLS技术进行层次回归分析, 要求逐步增加预测变量来解释因变量的变化(Keil, Rai, & Liu, 2012)。首先检验控制变量, 接着加入自变量, 最后将每个预测变量的双向交互单独进行, 从而避免变量的共线性减弱交互效应的作用。按照该步骤, 构造和评价了三个模型, 以此来检验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对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影响, 以及生活满意度和收入对其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 如表 4 所示。其中 H1、H2 和 H3 可分别通过模型 2a 进行检验, H4a、

H4b、H4c、H5a、H5b 和 H5c 可分别通过模型 3a、3b、3c、3d、3e 和 3f 进行检验。模型 2b 则用来检验调节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作用。通过 Bootstrap 分析可以获得 *t* 值和被解释的方差(R^2), Bootstrap 样本大小与实际样本量大小(203)相同。回归分析的结果解释了因变量的变化。每个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R^2 和效应值(表示 R^2 的增量变化)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模型 1)可知, 控制变量对养老生活支持感没有显著影响, 表明职工个体的性格特征与其感知的养老生活支持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关系。由模型 2a 可知, 养老保障政策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

表 3 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及信度

变量	<i>M</i> (<i>SD</i>)	Cronbach α 's	C1	C2	C3	C4	C5	C6	EV	SV	PV	SL	IC	LS
C1	5.14 (1.22)	0.83	<i>CR</i> =0.92 <i>AVE</i> =0.86											
C2	4.80 (1.23)	0.84	0.62**	<i>CR</i> =0.89 <i>AVE</i> =0.67										
C3	4.75 (1.25)	0.85	0.54**	0.60**	<i>CR</i> =0.90 <i>AVE</i> =0.69									
C4	4.88 (1.25)	0.91	0.65**	0.74**	0.67**	<i>CR</i> =0.94 <i>AVE</i> =0.79								
C5	4.62 (1.32)	0.88	0.20**	0.38**	0.29**	0.35**	<i>CR</i> =0.92 <i>AVE</i> =0.80							
C6	4.62 (1.46)	0.86	0.41**	0.64**	0.63**	0.65**	0.38**	<i>CR</i> =0.94 <i>AVE</i> =0.88						
EV	4.88 (1.11)	0.87	0.84**	0.95**	0.64**	0.78**	0.34**	0.61**	/					
SV	4.73 (1.14)	0.91	0.65**	0.74**	0.90**	0.93**	0.35**	0.70**	0.78**	/				
PV	4.48 (1.15)	0.82	0.35**	0.59**	0.53**	0.58**	0.87**	0.78**	0.55**	0.61**	/			
SL	4.11 (1.39)	0.90	0.35**	0.50**	0.54**	0.45**	0.36**	0.57**	0.49**	0.54**	0.54**	<i>CR</i> =0.92 <i>AVE</i> =0.70		
IC	3.13 (0.79)	1.00	-0.11	-0.17*	-0.13	-0.07	0.001	-0.20**	-0.16*	-0.11	-0.11	-0.06	<i>CR</i> =1.00 <i>AVE</i> =1.00	
LS	4.89 (0.76)	0.82	0.54**	0.67**	0.60**	0.65**	0.36**	0.62**	0.68**	0.69**	0.57**	0.47**	-0.10	<i>CR</i> =0.88 <i>AVE</i> =0.65

注：(1)C1=效益性, C2=充分性, C3=公平性, C4=回应性, C5=适当性, C6=共享性, EV =经济价值, SV =社会价值, PV =政治价值, SL=生活满意度, IC=收入, LS=养老生活支持感;

(2)使用双尾检验, *显著性水平 $p=0.05$, ** 显著性水平 $p=0.01$

表 4 层次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模型 3c	模型 3d	模型 3e	模型 3f
层次 1: 控制变量									
个性	-0.11	-0.05	-0.06	-0.06	-0.06	-0.07	-0.05	-0.06	-0.05
所在企业	0.06	0.05	0.05	0.04	0.04	0.05	0.08	0.08	0.07
层次 2: 主效应									
经济价值		0.34**	0.33**	0.34**	0.35**	0.34**	0.35**	0.36**	0.35**
社会价值		0.30**	0.28**	0.28**	0.26**	0.29**	0.33**	0.32**	0.33**
政治价值		0.20**	0.19**	0.18**	0.19*	0.17*	0.18**	0.18**	0.17**
生活满意度			0.06	0.06	0.06	0.07			
收入			0.03				0.03	0.04	0.04
层次 3: 调节效应									
经济价值 $\times$ 生活满意度				-0.07*					
社会价值 $\times$ 生活满意度					-0.08*				
政治价值 $\times$ 生活满意度						-0.05			
经济价值 $\times$ 收入							-0.13*		
社会价值 $\times$ 收入								-0.12*	
政治价值 $\times$ 收入									-0.15**
ΔR^2 (养老生活支持感)		0.540	0.003	0.006	0.006	0.002	0.013	0.012	0.018
f^2 (效应值)		1.219	0.007	0.014	0.014	0.005	0.030	0.028	0.042
R^2 (养老生活支持感)	0.017	0.557	0.560	0.563	0.563	0.559	0.570	0.569	0.575
F 值(F Hierarchical)		240.135	1.330	2.677	2.677	0.884	5.895	5.429	8.259

注：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水平：* $p=0.05$, ** $p=0.01$, 所有路径系数为标准化系数。

政治价值对养老生活支持感都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因此 H1、H2 和 H3 成立。由模型 3a-3f 可以看到, 生活满意度对养老保障政策的经济价值、社会

价值和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关系起到负面调节效应, 但对政治价值和养老生活支持感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因此 H4a 和 H4b 成立, 而 H4c 不成

立。同时,收入也会显著减弱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对于养老生活支持感的积极影响,因此 H5a、H5b 和 H5c 均成立。通过比较模型 3a-3e 与模型 2a 的 F 层次增加值,除模型 3c 中 F 层次增加值不显著外,其他均显著,因此进一步验证了生活满意度和收入调节作用的显著性。经过上述分析,得到所有假设检验的结果如表 5 所示。

5 讨论和启示

5.1 理论启示

本研究对于我国养老保障政策的制定、执行和改善以及如何提高民营企业职工的养老生活支持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首次从民营企业职工的视角揭示了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对养老生活支持感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表明养老保障政策对职工的老年生活起到了基础保障功能,而无论是政策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不能忽视。因此,养老保障政策价值的提升需要均衡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从而全面提高民营企业职工的养老生活支持感。第二,首次将政策因素与非政策因素相结合,研究其对职工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共同作用。结果表明,民营企业职工当前的生活满意度和收入将调节影响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的作用,突破了过去研究中单纯考虑政策或非政策某一方面的局限性,对于今后设计养老保障组合治理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5.1.1 养老保障政策价值的直接效应

从民营企业职工的角度来看,养老保障政策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都具有积极的作用(H1、H2 和 H3),表明民营企业职工感知的养老保障政策价值高低是衡量其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必要条件。养老保障政策价值的优化是提高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基础因素,加强养老保

障政策的效益性、充分性、公平性、适当性和共享性,强化养老保障政策与受益群体的互动和反馈,是提高其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关键环节。政府不应仅仅注重养老保障基金规模和基数的增长,还应该注重养老保障的覆盖面、可监督性及共享性,进一步缩小民营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待遇差距,使得养老保障能够真正惠及全民。同时不能仅仅关注政策执行环节,而应该贯穿到整个政策过程,即从政策制定入手,跟踪政策实施,改善政策实施环境,对政策实施结果进行反馈和改进,惟有如此,才能使养老保障政策真正满足社会需求,保证政策的可持续性。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层面的政策价值可能存在差异,从表 4(模型 2a)中可以看到,养老保障政策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与养老生活支持感之间的路径系数各有不同,抛开统计性检验的因素,似乎说明三种政策价值对养老生活支持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政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民营企业职工更为看重的两个要素。因此,政策制定人员在政策制定和论证时,不仅要兼顾政策的全面性,而且应该突出政策的目标和重点,着力改善群众的主要诉求,使养老保障政策达到最好的效果,这也是今后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5.1.2 生活满意度和收入的调节效应

从表 4 可知,民营企业职工当前的生活满意度和收入会调节影响养老保障政策价值与养老生活支持感之间的关系。若他们当前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其感知的养老保障政策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对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影响将会减弱(H4a 和 H4b)。而低收入职工与高收入职工相比,养老保障政策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对养老生活支持感的作用更为明显(H5a、H5b 和 H5c)。这一发现解释了过去

表 5 假设检验结果

模型	假设	结果
主效应	H1: 养老保障政策经济价值 $\rightarrow$ 养老生活支持感	支持
	H2: 养老保障政策社会价值 $\rightarrow$ 养老生活支持感	支持
	H3: 养老保障政策政治价值 $\rightarrow$ 养老生活支持感	支持
调节效应	H4a: 养老保障政策经济价值 $\times$ 生活满意度 $\rightarrow$ 养老生活支持感	支持
	H4b: 养老保障政策社会价值 $\times$ 生活满意度 $\rightarrow$ 养老生活支持感	支持
	H4c: 养老保障政策政治价值 $\times$ 生活满意度 $\rightarrow$ 养老生活支持感	不支持
	H5a: 养老保障政策经济价值 $\times$ 收入 $\rightarrow$ 养老生活支持感	支持
	H5b: 养老保障政策社会价值 $\times$ 收入 $\rightarrow$ 养老生活支持感	支持
	H5c: 养老保障政策政治价值 $\times$ 收入 $\rightarrow$ 养老生活支持感	支持

研究中关于养老保障和养老生活之间并非存在必然因果关系的阐述。生活满意度、收入与养老保障政策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的交互作用图如图 2 所示。可以清楚看到,生活满意度和养老保障政策政治价值在各自的一个标准差范围内没有产生交互点,因此没有显著的交互作用。而除此之外,其余五个两两变量之间的交互均产生了交互点,因而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从图中的斜率可以判断,当生活满意度和收入越高,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对养老生活支持感的积极作用越小。该图并未反映生活满意度和收入同时作用的结果,但是可以肯定,这两个变量均能独立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凸显了提高民营企业职工养老生活支持感的两个重要途径,即政策途径和非政策途径。在政策途径方面,主要依赖于相关政府部门做好养老的基础保障工作,由国家通过法制手段干预,对养老生活的保障更加直接有效。而在非政策途径方面,则需要通过企业、社区、家庭等多方面的支持,减少对于养老保障政策的单一依赖,全方位地提高职工的养老生活支持感。

生活满意度和收入的调节效应还在时间维度上反映了养老生活支持感的两个来源,即养老生活阶段的保障和养老前生活阶段的保障。过去研究认为养老生活的支持感是针对养老生活阶段的老年人而言的,但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作为体现养老生活阶段的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对在工作人员的养老生活支持感有直接影响,而体现养老前生活阶段保障的当前生活满意度和收入水平会调节影响养老保障政策价值与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关系。深化对职工养老生活的支持,既应保障其老年阶段的生活水平,也应提高职工当前的生活保障,从而减轻其对未来生活的担忧。

5.2 实践启示

研究结果对于养老保障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都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意义。良好的养老保障政策价值是提升养老生活支持感的重要前提,如何提升政策价值是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的管理者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政策制定者来说,需要结合实际问题,科学预测政策的未来发展,通过对政策的客观评估,最终制定目标清晰、内容明确的养老保障政策。对政策执行者来说,需要运用各种政策资源,建立高素质的执行队伍,加强组织间的协调沟通,快速高效地实现政策的既定目标。

对相关政府部门来说,应该积极提高当前民营

企业职工的收入和生活满意度。高收入和良好的生活满意度能够减少职工对养老保险政策的依赖。提高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不仅可以改善职工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会大幅度减少国家的养老负担。由于转制成本等原因,我国企业职工养老的个人账户并未做实,当前供养方式仍然以当代劳动者供养上一代老年人为主,如果当代劳动者对养老保险的依赖性减弱,则可以减少下一代劳动者的供养负担。因此,对相关政府部门来说,解决养老支付压力大的问题,可以从提高当前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满意感作为着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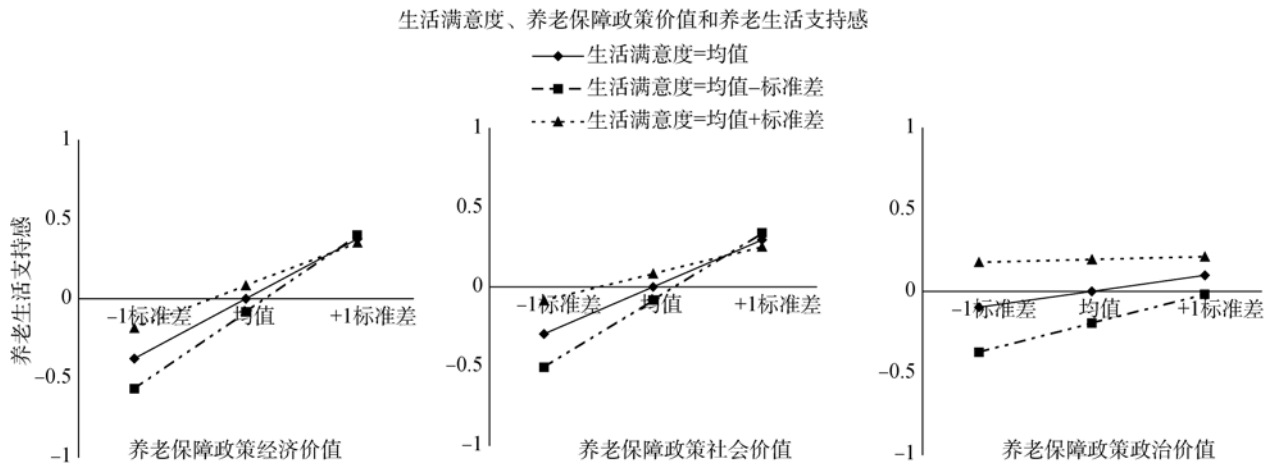
对职工所在企业来说,除基本养老保险之外,还应该为职工提供更多的经济保障。根据一定的合约关系,雇主应该为雇员的老年生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国家强制企业和职工共同缴纳的基础养老金仅能满足养老的基本生活需要,若要提高职工的养老生活质量,企业需要为职工提供更多的经济保障。企业可以自发建立养老年金制度(企业以职工福利形式设立的一种补充养老保险形式),既能够增加职工养老生活的支持感,也会提高其工作积极性(促进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对企业和职工均有益处。

从责任主体的分担来看,职工对养老生活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民营企业职工来说,为提高自己的养老生活支持感,应加强自我养老的责任。在自身收入能承担的前提下,除了积极参加国家设立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养老储蓄金或商业养老保险。同时,民营企业职工也应该积极主动地了解养老保障政策内容,明确各方的责任和义务,用法律手段坚决维护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首次将养老保障的政策性因素和非政策性因素相结合,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结果表明,从民营企业职工的角度来看,养老保障政策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对其养老生活支持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起到了基础保障作用。养老保障政策价值的提升应该均衡兼顾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因素。此外,民营企业职工当前的高生活满意度和收入会降低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对养老生活支持感的积极影响,表明建立良好的养老保障政策是提高对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职工养老生活支持感并非单纯由政

(1) 生活满意度与养老保障政策价值的交互作用



(2) 收入与养老保障政策价值的交互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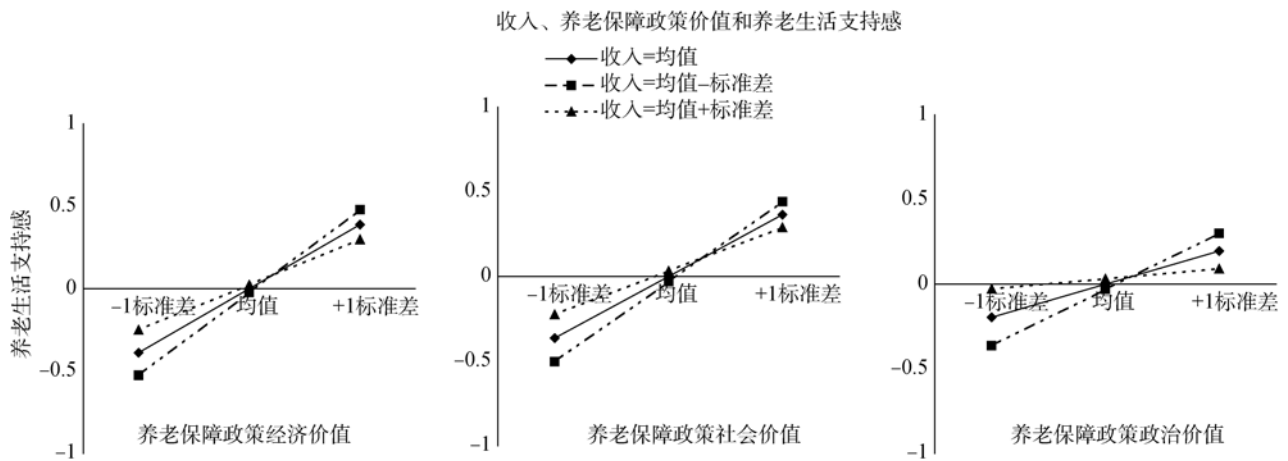


图2 生活满意度、收入与养老保障政策价值的交互作用图

策性或非政策性因素所决定,而是取决于两类因素的均衡程度。提高民营企业职工当前的生活满意度和收入,可以达到同时提高其现有生活水平和减少国家养老支付压力的双重目标。

今后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扩展。第一,可以研究养老保障政策价值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改善政策价值,提高居民的养老生活支持感。第二,深入探讨养老保障政策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职工养老生活支持感的相对重要性。第三,鉴于民营企业职工是今后我国养老保障的重点,本文主要从民营企业职工的角度进行考察,未来可以比较养老保障及其影响机制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政府和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差异。第四,可以从其它相关主体的视角(如政策执行者、审计人员等),来探讨和比较养老保障政策价值对养老生活支持感的影响程度。

参 考 文 献

- Béland, D., & Yu, K. M. (2004). A long financial march: Pension reform in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3, 267-288.
- Birkland, T. A. (2010).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cy process: Theories, concepts, and models of public policy making* (3rd ed.). New York: ME Sharpe.
- Bozeman, B., & Sarewitz, D. (2011). Public value mapping and science policy evaluation. *Minerva*, 49(1), 1-23.
- Bozo, Ö., Toksabay, N. E., & Kürüm, O. (2009).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depression, and social support among elderly Turkish people.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43(2), 193-206.
- Cai, F., Giles, J., O'Keefe, P., & Wang, D. W. (2012). *The elderly and old age support in Rural China*. Washington: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 Chalise, H. N., Saito, T., Takahashi, M., & Kai, I. (2007). Relationship specialization amongst sources and receivers of social support and its correlations with loneli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cross sectional study of Nepalese older adults.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44(3),

- 299–314.
- Chen, G. (2003). *Endowment ways in China*.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陈功. (2003). 我国养老方式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Chin, W. W. (1998).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fo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G. A. Marcoulides (Ed.), *Modern methods for business research* (pp. 295–336). Mahwah, NJ, U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Deng, D. S., & Xue, H. Y. (2010). The analysis of difficulty in the new type of rural social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individual, collective and government's ability to raise funds.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1(1), 86–92.
- [邓大松, 薛惠元. (2010).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推行中的难点分析—兼析个人、集体和政府的筹资能力. *经济体制改革*, 1(1), 86–92.]
- Diener, E., Diener, M., & Diener, C. (1995). Factors predic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n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5), 851–856.
- 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 Griffin, S.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1), 71–75.
- Diener, E., & Lucas, R. E. (1999).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Series*, 37(1), 75–102.
- Diener, E., Tay, L., & Oishi, S. (2013). Rising income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n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2), 267–272.
- DiNapoli, T. P. (2012). Retirement security for Americans and the role of defined-benefit pension pla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2(4), 483–484.
- Dolan, P., & Metcalfe, R. (2012a).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Recommendations on measures for use by national government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41(2), 409–427.
- Dolan, P., & Metcalfe, R. (2012b). Valuing health: A brief repor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versus preferences.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32(4), 578–582.
- Dolan, P., & White, M. P. (2007). How can measur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be used to inform 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71–85.
- Dong, K. Y., & Sun, B. (2011). From multi-tiered to multi-pillar: Rethinking of old-age security system reformation.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8(1), 1–9.
- [董克用, 孙博. (2011). 从多层次到多支柱: 养老保障体系改革再思考. *公共管理学报*, 8(1), 1–9.]
- Dunn, W. N. (2003).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The Chinese People's Publishing Press.
- Eisenberger, R., Huntington, R., Hutchison, S., & Sowa, D. (1986).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1(3), 500–507.
- Easterlin, R. A., McVey, L. A., Switek, M., Sawangfa, O., & Zweig, J. S. (2010). The happiness-income paradox revisite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7(52), 22463–22468.
- Fernández, J. J., & Jaime-Castillo, A. M. (2013). Positive or negative policy feedbacks? Explaining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s pragmatic pension policy reform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1), 78–85.
- Ferrer-i Carbonell, A. (2005). Income and well-be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parison income effec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5–6), 997–1019.
- 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2), 39–50.
- Frommert, D., Heien, D. H., & Andreli, H. (2009). *Pension systems and the challenge of population ageing: What does the public think?* England: The Policy Press.
- Gefen, D., & Straub, D. (2005). A practical guide to factorial validity using PLS-graph: Tutorial and annotated example. *Commun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16, 109–116.
- Golden, J., Conroy, R. M., Bruce, I., Denihan, A., Greene, E., Kirby, M., & Lawlor, B. A. (2009). Loneliness,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mood and wellbeing in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4(7), 694–700.
- Hanel, B., & Riphahn, R. T. (2012). The timing of retirement—new evidence from Swiss female workers. *Labour Economics*, 19(5), 718–728.
- Hanson, B. S., Liedberg, B., & Öwall, B. (1994). Social network, social support and dental status in elderly Swedish men. *Community Dentistry and Oral Epidemiology*, 22(5), 331–337.
- Jovanovic, V. (2011).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ne neglected model of personality and two forgotten aspec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0(5), 631–635.
- Jupe, R. (2012). Evolutionary change? An evaluation of the McNulty report on rail.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 32(3), 177–184.
- Keil, M., Rai, A., & Liu, S. (2012). How user risk and requirements risk moderate the effect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control on the process performance of IT projects.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doi: 10.1057/ejis.2012.42
- Kim, E. H. (2012). *Public support, family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Evidence from a new government old-age pension in Korea*. Durham,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ee, R., & Mason, A. (2011). The price of maturity: Aging populations mean countries have to find new ways to support their elderly. *Finance & Development*, 48(2), 6–11.
- Li, Z., & Wang, H. D. (2009).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te of return and the replacement rate of individual Basic Pension Accounts.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6(4), 45–51.
- [李珍, 王海东. (2009).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收益率与替代率关系定量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 6(4), 45–51.]
- Lindell, M. K., & Whitney, D. J. (2001). Accounting for common method variance in cross-sectional research desig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1), 114–122.
- Malhotra, N. K., Kim, S. S., & Patil, A. (2006). Common method variance in IS research: 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approaches and a reanalysis of past research. *Management Science*, 52(12), 1865–1883.
- McBride, M. (2001). Relative-income effect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he cross-s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45(3), 251–278.
- Meneguello, R. (2005). Government popularity and public attitudes to social security reform in Brazi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7(2), 173–189.
- Mesa-Lago, C. (2007). Social security in Latin America: Pension and health care reforms in the last quarter century.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42(2), 181–201.

- Mu, G. Z. (2004). An analysis of the ment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4), 124–129.
- [穆光宗. (2004). 老龄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4), 124–129.]
- Petter, S., Straub, D., & Rai, A. (2007). Specifying formative constructs in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MIS Quarterly*, 31(4), 623–656.
- Pinquart, M., & Sörensen, S. (2000). Influence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social network, and competenc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y and Aging*, 15(2), 187–224.
- Quadagno, J., & Pederson, J. E. (2012). Has support for social security declined?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pension scheme in the USA, 2000 and 20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1(S1), S88–S100.
- Ravishankar, A. K. (2010). Ageing and family support of elderly in South India. *India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24(4), 482–500.
- Russell, D. W., Booth, B., Reed, D., & Laughlin, P. R. (1997). Personality, social network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mong alcoholics: A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5(3), 649–692.
- Shi, S. J. (2006). Left to market and family—again? Idea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pension policy in China.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40(7), 791–806.
- Soares, J. (2005). Social Security evaluation: A critique. *Macroeconomic Dynamics*, 9(1), 57–97.
- Steel, P., Schmidt, J., & Shultz, J. (2008). R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1), 138–161.
- Taylor-Gooby, P. (2002). The silver age of the welfare state: perspectives on resilience.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1(4), 597–621.
- van Vliet, O., Been, J., Caminada, K., & Goudswaard, K. (2012). Pension reform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older people in 15 Europea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1(S1), S8–S29.
- Wentworth, D. N., Neaton, J. D., & Rasmussen, W. L. (1983). An evalua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master beneficiary record file and the national death index in the ascertainment of vital statu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3(11), 1270–1274.
- Xu, H. W. (2009). *The research on China's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y School.
- [徐宏伟. (2009). *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
- Zheng, G. C. (2008). *Social security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Ideas, targets and action plans*. Beijing, China: People's Publishing Press.
- [郑功成. (2008).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 理念, 目标与行动方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Zimet, G. D., Dahlem, N. W., Zimet, S. G., & Farley, G. K. (1988).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52(1), 30–41.

附录 1: 共同方法偏差的标记变量分析

表 1-1 标记变量与学习变量的相关系数

变量	C1	C2	C3	C4	C5	C6	SL	IC	LS	M1	M2
C1	1.00										
C2	0.62	1.00									
C3	0.54	0.60	1.00								
C4	0.65	0.74	0.67	1.00							
C5	0.20	0.38	0.29	0.35	1.00						
C6	0.41	0.64	0.63	0.65	0.38	1.00					
SL	0.35	0.50	0.54	0.45	0.36	0.57	1.00				
IC	-0.11	-0.17	-0.13	-0.07	0.001	-0.20	-0.06	1.00			
LS	0.54	0.67	0.60	0.65	0.36	0.62	0.47	-0.10	1.00		
M1	-0.07	0.02	0.004	-0.001	0.02	0.03	0.01	-0.06	-0.04	1.00	
M2	-0.12	-0.15	0.04	-0.02	0.10	0.07	0.03	-0.01	-0.003	0.06	1.00

表 1-2 修正的相关系数

变量			修正前	M1	t	M2	t	M _{1avg}	t	M _{2avg}	t
R	(C1,	C2)	0.62	0.62	11.24	0.62	11.26	0.63	11.34	0.62	11.31
R	(C1,	C3)	0.54	0.54	9.04	0.54	9.07	0.54	9.15	0.54	9.11
R	(C1,	C4)	0.65	0.65	12.05	0.65	12.08	0.65	12.16	0.65	12.12
R	(C1,	C5)	0.20	0.20	2.86	0.20	2.89	0.21	2.97	0.20	2.93
R	(C1,	C6)	0.41	0.41	6.42	0.41	6.45	0.42	6.52	0.42	6.49
R	(C1,	SL)	0.35	0.35	5.34	0.35	5.37	0.36	5.45	0.36	5.41
R	(C1,	IC)	-0.11	-0.11	-1.51	-0.10	-1.47	-0.10	-1.35	-0.10	-1.41
R	(C1,	LS)	0.54	0.54	9.00	0.54	9.02	0.54	9.10	0.54	9.07
R	(C2,	C3)	0.60	0.60	10.66	0.60	10.68	0.61	10.76	0.60	10.73
R	(C2,	C4)	0.74	0.74	15.56	0.74	15.59	0.74	15.68	0.74	15.64
R	(C2,	C5)	0.38	0.38	5.77	0.38	5.80	0.38	5.88	0.38	5.84
R	(C2,	C6)	0.64	0.64	11.63	0.64	11.66	0.64	11.74	0.64	11.70
R	(C2,	SL)	0.50	0.50	8.07	0.50	8.09	0.50	8.17	0.50	8.14
R	(C2,	IC)	-0.17	-0.17	-2.39	-0.16	-2.35	-0.16	-2.23	-0.16	-2.29
R	(C2,	LS)	0.67	0.67	12.75	0.67	12.77	0.67	12.86	0.67	12.82
R	(C3,	C4)	0.67	0.67	12.82	0.67	12.85	0.67	12.93	0.67	12.89
R	(C3,	C5)	0.29	0.29	4.33	0.29	4.35	0.30	4.44	0.30	4.40
R	(C3,	C6)	0.63	0.63	11.38	0.63	11.41	0.63	11.49	0.63	11.45
R	(C3,	SL)	0.54	0.54	9.15	0.54	9.17	0.55	9.25	0.55	9.21
R	(C3,	IC)	-0.13	-0.13	-1.87	-0.13	-1.83	-0.12	-1.71	-0.12	-1.77
R	(C3,	LS)	0.60	0.60	10.60	0.60	10.62	0.60	10.70	0.60	10.67
R	(C4,	C5)	0.35	0.35	5.26	0.35	5.29	0.35	5.37	0.35	5.33
R	(C4,	C6)	0.65	0.65	12.03	0.65	12.06	0.65	12.14	0.65	12.1
R	(C4,	SL)	0.45	0.45	7.05	0.45	7.07	0.45	7.15	0.45	7.11
R	(C4,	IC)	-0.07	-0.07	-1.01	-0.07	-0.98	-0.06	-0.87	-0.06	-0.92
R	(C4,	LS)	0.65	0.65	12.16	0.65	12.19	0.66	12.27	0.65	12.24
R	(C5,	C6)	0.38	0.38	5.74	0.38	5.77	0.38	5.85	0.38	5.81
R	(C5,	SL)	0.36	0.36	5.38	0.36	5.40	0.36	5.49	0.36	5.45
R	(C5,	IC)	0.001	0.001	0.02	0.003	0.05	0.01	0.15	0.01	0.10
R	(C5,	LS)	0.36	0.36	5.43	0.36	5.46	0.36	5.54	0.36	5.50
R	(C6,	SL)	0.57	0.57	9.90	0.57	9.92	0.58	10.00	0.58	9.97
R	(C6,	IC)	-0.20	-0.20	-2.89	-0.20	-2.85	-0.19	-2.72	-0.19	-2.78
R	(C6,	LS)	0.62	0.62	11.19	0.62	11.22	0.62	11.3	0.62	11.26
R	(SL,	IC)	-0.06	-0.06	-0.90	-0.06	-0.86	-0.05	-0.75	-0.06	-0.80
R	(SL,	LS)	0.47	0.47	7.55	0.47	7.58	0.48	7.66	0.47	7.62
R	(IC,	LS)	-0.10	-0.10	-1.36	-0.09	-1.33	-0.09	-1.22	-0.09	-1.27

注：C1=效益性, C2=充分性, C3=公平性, C4=回应性, C5=适当性, C6=共享性, SL=生活满意度, IC=收入, LS=养老生活支持感, M1=性别, M2=年龄; R_{M1} =M1 和 C4 的相关系数, R_{M2} =M2 和 LS 的相关系数, 同时, R_{M1avg} =M1 与学习变量相关系数的均值, R_{M2avg} =M2 与学习变量相关系数的均值。

附录 2: 变量分项对总项的相关系数

表 2-1 二阶变量分项对总项的相关系数

测度项	EV	SV	PV	SL	IC	LS
C1	0.89	0.65	0.50	0.35	-0.11	0.53
C2	0.90	0.72	0.71	0.50	-0.17	0.67
C3	0.63	0.91	0.67	0.54	-0.13	0.60
C4	0.77	0.92	0.70	0.44	-0.07	0.65
C5	0.57	0.59	0.85	0.47	-0.07	0.49
C6	0.59	0.70	0.87	0.57	-0.20	0.63

表 2-2 一阶变量分项对总项的相关系数

	C1	C2	C3	C4	C5	C6	SL	IC	LS
C11	0.93	0.58	0.48	0.59	0.21	0.39	0.32	-0.08	0.52
C12	0.92	0.57	0.52	0.61	0.16	0.37	0.33	-0.12	0.47
C21	0.46	0.74	0.37	0.46	0.28	0.46	0.34	-0.03	0.44
C22	0.54	0.88	0.55	0.67	0.34	0.57	0.46	-0.13	0.60
C23	0.43	0.83	0.46	0.55	0.40	0.61	0.49	-0.19	0.54
C24	0.61	0.84	0.57	0.72	0.23	0.45	0.34	-0.19	0.61
C31	0.49	0.42	0.79	0.53	0.19	0.41	0.35	-0.05	0.48
C32	0.41	0.45	0.84	0.52	0.22	0.52	0.47	-0.11	0.47
C33	0.47	0.54	0.83	0.58	0.31	0.51	0.44	-0.10	0.54
C34	0.43	0.57	0.85	0.59	0.25	0.63	0.54	-0.17	0.51
C41	0.58	0.57	0.55	0.83	0.28	0.54	0.32	-0.04	0.53
C42	0.62	0.71	0.58	0.91	0.26	0.59	0.40	-0.04	0.59
C43	0.57	0.69	0.62	0.93	0.36	0.57	0.40	-0.12	0.59
C44	0.54	0.66	0.64	0.90	0.34	0.61	0.45	-0.06	0.61
C52	0.21	0.34	0.30	0.34	0.90	0.34	0.39	-0.02	0.30
C53	0.22	0.36	0.30	0.36	0.91	0.36	0.32	0.03	0.34
C54	0.10	0.31	0.19	0.23	0.88	0.31	0.25	-0.01	0.32
C63	0.36	0.53	0.55	0.56	0.38	0.94	0.56	-0.18	0.56
C64	0.42	0.66	0.63	0.65	0.32	0.93	0.52	-0.20	0.61
SL1	0.31	0.48	0.53	0.44	0.29	0.53	0.85	-0.05	0.44
SL2	0.28	0.41	0.39	0.40	0.30	0.49	0.81	-0.03	0.38
SL3	0.32	0.42	0.50	0.40	0.30	0.46	0.89	-0.02	0.43
SL4	0.29	0.43	0.42	0.34	0.33	0.48	0.85	-0.07	0.39
SL5	0.27	0.31	0.41	0.26	0.25	0.44	0.77	-0.10	0.31
IC1	-0.11	-0.17	-0.13	-0.07	0.00	-0.20	-0.06	1.00	-0.10
LS1	0.43	0.49	0.41	0.48	0.27	0.44	0.38	-0.07	0.77
LS2	0.44	0.53	0.51	0.54	0.32	0.52	0.40	-0.07	0.84
LS3	0.42	0.61	0.52	0.55	0.25	0.54	0.34	-0.09	0.84
LS4	0.43	0.52	0.48	0.53	0.31	0.50	0.39	-0.08	0.77

How Life Satisfaction and Income Moderate the Effects of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Values on the Retirement Life Support Perceived by Employees in Private Firms

LI Suli¹; ZHANG Jinlong¹; LIU Shan²

⁽¹⁾ School of Manage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²⁾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endowment insurance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e effect of endowment insurance on retirement life support has also received significant research attention.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combine policy and non-policy factors of endowment insurance. Foll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ecution of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in our country, a research model of the moderation of the effects of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values on the perceived retirement life support by improving the life satisfaction and income of employees in private firms is presented. The model was empirically tested based on a survey of 203 respondents from 15 private firms in China.

Th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values of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have direc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retirement life support perceived by employees in private firms.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has basic functions in the retirement of employees. All of its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values cannot be neglected. To realize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value,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should be balanced.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increase in size and numbers of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but also emphasize the coverage, supervision, and share of endowment insurance.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narrow the gap of pension treatment between employees in private firms and those in government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so that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can cover all kinds of employees. Not only should the policy execution be followed with interest, but also the entire process of the polic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mployees for their retirement life, the improvement of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should start with the policy design. The mechanism of traced policy execution, controllabl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circular policy results should also be established.

Additionally, the current life satisfaction and income of employees in private firms suppres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values on the perceived retirement life support, which suggests that fair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is a prerequisite, but is still not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retirement life support. By improving the life satisfaction and income of employees in private firms, their current level of satisfaction can also be improved and the pressure imposed by the government on pension payment can be reduced. The perceived retirement life support is not only dependent on the policy or non-policy factors, but also relies on the balance of these two factors. This finding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design of long-term portfolios of governance on endowment insurance.

Finally, the effects of moderation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income also indicate the source of the perceived retirement life support, that is, the security before and after retirement. In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perceived retirement life support is limited only after retirement and focused on old people. However,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as the reflection of the status after retirement,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values have direct effects on the retirement life support for the employees, whereas life satisfaction and income, which represent the status before retirement, moderate the effects of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on the perceived life support.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 for the retirement life of employees could result in improvemen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before and after retirement.

Key words Endowment insurance; policy value; private firm; perceived life support; satisfaction